



田 培 林

老師的老師

歐陽教(國立文化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施宜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所博士、台北縣樂利國小教師)撰

壹. 前言

教育是傳遞、繁殖及創造文化的歷程。因此，教育負有將先人的文化遺產傳遞給下一代的使命。此外，教育的最終目標在於「教人成人」，亦即從一自然人成為文化人。所以，教育也應使受教個體的主觀精神能夠在文化材等客觀精神中涵養及成長，使其從自然人經由教育歷程的陶冶而成為文化人，如此才能傳遞、繁殖及創造文化，進而使人類文化呈現合理多元的樣貌。由此可知，教育活動與人類文化的開展息息相關，甚至可稱教育本身即是一種文化活動，同時也可間接窺見教育與文化二者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就教育與文化二者間之關係，我國文化教育專家田培林先生（1893-1975）有其發人深省的見解，其認為教育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有一種內在交插、連環，不能分解的關係，絕不能夠在二者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田培林，1995：10）。因此，田培林先生始終認為教育即是一種文化活動，而且是一種高度的文化活動。

再者，除了田培林先生對於教育與文化二者間之關係，有其獨到的見解。綜觀田培林先生一生，對於我國教育的開展亦貢獻良多。就實而言，田培林先生除早年於大陸的教育事蹟為人所稱道外，亦於1945年台灣光復之初，代表當時中央政府來台視察教育之情形，並且是當時視察教育情形最高層級的官員，對於台灣教育有著諸多的貢獻。我國教育學者伍振鷺先生即敘述光復之初，田培林先生剛好在教育部擔任常務次長，對於早期台灣教育的接收以及政策的規劃多所著力。田培林先生曾奉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驊先生之命，來台策劃與指導國語的推行（伍振鷺，1986：29）。1949年大陸淪陷，田培林先生第二次渡海來台，更盡心於台灣教育的開展。尤其，為其一生中服務最久的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籌設了教育研究所，培育無數從事教育理論研究及實踐的學者，對台灣教育界的影響確實深遠。台灣教育先進如賈馥茗先生、伍振鷺先生、郭為藩先生、歐陽教先生、黃光雄先生及林清江先生等人，都曾為文敘述受教於



田培林先生，並深受其影響。因之，不難窺見田培林先生對於台灣教育發展的影響。

持平而論，對於一位深墾台灣教育之教育家的傳略，我們應當有所瞭解。基此認識，本文試圖勾勒出田培林先生之生平，希冀以此為基礎鋪陳出田培林先生之傳略，讓人們瞭解此位深墾台灣教育之教育家的傳略。

貳. 田培林先生的生平

關於田培林先生的生平，筆者將參酌賈馥茗先生之分法，分為以下幾個時期敘述之，包括家世和幼年生活、從高等小學堂到北京大學的求學生活、北京大學畢業後初期的教育工作、留學德國時期的生活、對日抗戰期間的政教工作、臺灣師範大學時期的教育工作、家人與晚年生活，茲闡述田培林先生生平如下：

一、家世和幼年生活

先生諱培林，字伯蒼，河南襄城縣人。先世居河北滿城縣，明季有明威將軍者，鎮襄城（河南），遂籍焉（劉延濤，1976：1）。所以田氏族人，仍保留了很多傳統的習俗，和當地人並不相同（賈馥茗，1976b：2）。

田氏傳到田培林先生的曾祖父荊璧公的時候，已經是襄城的望族，富有田產，並且設有銀號。中原民風淳樸，富有之家而好仁的，是必然的公益事業興辦者和贊助者，也是貧民的存活者，荊璧公便是一位特別熱心公益和樂於濟助貧困的長者。田先生的祖父經畬公，元配朱太夫人生了田先生的父親樹棠



▲ 田培林先生獨照
圖：臺灣師範大學提供

公（字芾卿）後去世；繼配張太夫人過門不久，經畚公去世，所以樹棠公是在侍奉繼母如親母的家庭生活中，教養自己的子女。而田先生的母親宋太夫人的孝順，和樹棠公相得益彰。有一年，張太夫人患了傷寒，宋太夫人晝夜侍奉，至於「以手指挖出口中凝血，用簪鉗引大腸積便」（見田培林先生所述先妣事略），是戚里稱道的孝婦，更受到眾人的敬重。因而，戚黨間有了糾紛，也要請宋太夫人代為排解，聽從宋太夫人的意見（賈馥茗，1976b：2）。而曾祖荊璧公，祖經畚公，父樹棠公，皆為邑中耆宿，扶危濟困，興水利，禦匪寇，為鄉人所崇敬，曾為刻石記事（劉延濤，1976：1）。

田培林先生於1893年11月21日出生（賈馥茗，1998：79）。在出生之前，宋太夫人已經有四個子女，但是都在幼年夭折，所以田先生出世後，實際上便成了獨子，備受呵護，對於飲食等物，有很多限制。直到十二歲，才准許吃些不易消化的食物。田培林先生幼年，仍然進的是私塾，和當時的一般蒙童一樣，讀很多並不懂得的經書。到新學制倡行以後，才到開封讀中學，然後入北京大學研讀哲學（賈馥茗，1976b：2）。

二、從高等小學堂到北京大學的求學生活

田培林先生初進河南襄城「高等小學堂」係新設，願意入學者甚少，有「勸學總董」常來勸各家子弟入學。當時那位勸學總董與田先生的父親相識；堂長是位老拔貢，頗負鄉譽，與田先生家略有淵源，所以家裡答應送先生入學。之後，田先生考取許州中學堂，中學畢業以後，先生便進入民國大學，後因袁世凱準備稱帝，就有人勸袁世凱說：「民國大學不能再用『民國』二字，於是改稱朝陽大學。因為校址在朝陽門內，可是「鳳鳴朝陽」的出典隱隱有勸進的意思，學生都不願意，很多人吵著轉學走了，田先生也就轉學至北京大學文科。當時北大只有文、理、法三科，北洋大學的法科歸併到北京大學來，北京大學的工科則併到天津北洋大學去，這是蔡元培先生仿照德國的榜樣（郭廷以、沈雲龍訪問，謝文孫記錄，1991：29-37）。



國立北京大學，係承襲前清的京師大學堂而來，京師大學堂則創立於1898年（毛子水，1981：1），包括有師範館、仕學館、譯學館等等（蔡元培，1981：26）。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洋務運動宣告破產，有志之士有感於救亡圖存，遂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人為領導，獲光緒帝的支持，於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進行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維新」或稱「戊戌變法」，變法維新運動中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措施即為「京師大學堂」的創設。1898年起清廷開始全面推行新政，決定興學，首先制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除本身為一最高學府外，同時也是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統轄各省各級學堂。但因隨即發生戊戌政變，慈禧依舊掌權，新政受挫，京師大學堂籌備工作陷於停頓，直至1902年，僅有仕學館及師範館短期班招收少數學生（劉季洪，1986：11）。民國後改稱北京大學，後又冠以「國立」二字（賈馥茗，1985：84），是實行新學制後的第一所國立大學，又設在首都，所以是全國首屈一指的最高學府。

蔡元培先生由教育總長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網羅中外學者到北大任教，所以教授陣容極盡一時之選（賈馥茗，1976b：3），如田培林先生在北大求學時，朱家驊先生為德文系系主任，胡適先生為英文系系主任等等。¹另一方面，那時候又正是中國文化發生大變革的時期。在政治方面，固然已經由帝制改為共和，可是帝制的餘孽尚未根除，清末的官僚變成軍閥；加上列強的侵略，民生困苦，難得安定。在思想方面，則受到外來文明的衝擊，革新務實成為主要的論點。在教育方面，則處於新舊交替，風氣漸開，新教育漸占優勢的局面，也正是教育主張轉變的時期（賈馥茗，1976b：3）。

此時國外適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會議中，中國備受歧視（賈馥茗，1985：84）。1919年5月4日，因聞日本向巴黎和會提出佔有我山東省境多項權益要求，北洋政府將令出席和會的代表簽字承認，北平學生幾千人反對，乃在天安門集合，並結隊遊行（田炯景，1981：46），此次引

1. 此段敘述為2000年11月30日伍振鷺先生在施宜煌碩士論文計畫發表時所言。

起了青年學子的愛國熱潮，北大便是率先反應的學府，倡議由改革而圖強。蔡元培先生身為校長，以其本身的學養，採用新觀念教導學生，使北大成為學術改革的主動力量，田培林先生身歷其境，直接受到這項衝擊的影響（賈馥茗，1985：84）。而田先生在就讀北大時的同學們，如楊亮功先生為田先生在北大的同屆同學（李安，1976：55），在學術上享譽成就的吳康先生及陳康先生則為田先生在北大的同班同學。²

田培林先生的興趣很廣泛，除了大學中必然的研習以外，便盡量領受故都的文化風味，而且家境富裕，有了機會，常常做課外消遣。田先生最喜歡的有三樣：吃小館、聽京戲、逛書攤。當時的北京，由於明清兩代定都，王侯之家講究品味。清朝鼎革以後，原來御廚和富貴之家的烹調，傳到市面，許多飯館，各以特長聞名。田培林先生在課餘，或者邀約二三朋友，或者獨自找一家擁有特味的飯館，去品嚐一番，因而對於北平的名菜，先生知之最諳（賈馥茗，1976b：3）。

聽京戲也是田培林先生的愛好之一，雖然當時所謂的「戲園子」，座位並不舒服，沒有什麼裝潢，演員的化妝術也沒有今天的美觀，可是名角卻各自有精湛的演技，或者以歌喉聞名，或者以動作獨步舞壇，嚴守京戲的規範，能給愛好者最高的享受，故而田先生不但對京戲的唱作，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對當時每個名伶的特長，說起來也歷歷如繪（賈馥茗，1976b：3）。

逛書店，買好書，是田培林先生最大的樂趣。當時書攤對人的吸引力，遠超過現代的百貨公司。珍本古籍，固然是學者和收藏家搜羅的對象。就是店主的親切態度、文雅的氣質，能夠和顧客談今論古，幾乎可以成為知交，更有很大的吸引力。至於是否做得成生意，反而並不重要。古玩店和書攤有類似的風味，田先生也常常去光顧，偶然搜集些小巧的珍玩，也是消遣之一途（賈馥茗，1976b：3-4）。

2. 此段敘述為民國2000年11月30日伍振鷺先生及歐陽教先生在施宜煌碩士論文計畫發表時所言。



田培林先生並沒有因為提倡白話文聞名，可是在北大時期，卻實際從事過推廣白話文的工作。因有一位田先生的友人，編輯一份白話文的刊物，因為稿件仍然免不掉文言語氣，便請田先生代為修正。於是田先生在助人之中，也養成了自己寫白話文的習慣。田先生日後所發表的文章，都是明暢易讀的白話文，便是植基於此時（賈馥茗，1976b：4）。

三、北京大學畢業後初期的教育工作

田培林先生於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即應聘到保定育德中學任教。田先生初任教職，便表現出循循善誘的風範，曾言在所教的國文課中，對作文一項，便教學生從辭能達意入手。最明顯的是曾經有一位學生，囿於文言文的窠臼，趨於文字的堆砌，而不能暢所欲言，先生便教他依照題意，先說出他想要說的話，



▲ 田培林先生

圖：臺灣師範大學提供

然後把所說的話寫出來，便是一篇通順的白話文。經過這番試驗，這位學生才恍然大悟「為文之道，求其辭達而已」的道理（賈馥茗，1976b：4）。

民國1921年，田培林先生為服務桑梓，回到河南後（賈馥茗，1976b：4），任教河南省立第一、第二中學、開封男女師範、法政專門等校（周邦道，1981：320）。曾任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召集委員李曜林先生，與曾任監察院教育委員會召集委員劉延濤先生，據所瞭解，是田培林先生在北大畢業後，執教中學時期的受業學生（李安，1976：55）。劉延濤先生就曾言受田先生課，為1924-1925年間，田先生教學生先自基本論理學始。自此而後，漸知讀書方法。〈大戴記〉：「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竊謂凡受學於田先生者，當皆有斯感（劉延濤，1976：1）。

3. 田培林先生的博士論文題目及博士學位授予日期，是筆者從賈馥茗先生所提供田先生之博士文憑得知。

當時河南省有一個各級學校教職員聯合會的組織，公選知名之士組織評議會。評議會是聯合會的最高權力機構，田培林先生於1922年當選為評議會主席，於是倡議為了發展河南省教育，以各縣契稅做為教育專款，以供教育專用。經過再三奔走折衝，得到執政者的允許。所以日後河南省教育發達，都認為是田先生倡議的功效（賈馥茗，1976b：4-5）。

在教學和發展地方教育之餘，田先生又和同學們開創了一個刊物，名為《少年河南》。每週出版一次，田先生每次都寫時評，反映知識青年的心聲，並且提倡設置河南大學，積極作育人才，遂使中州大學誕生，即是河南大學的前身。田先生也對留學政策，提出積極的建議，申述留學政策的要旨，和派遣留學生的目的（賈馥茗，1976b：5）。

1928年，又至北平，任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俄文法政專門等校講席（周邦道，1981：320），教授哲學和心理學等科目（賈馥茗，1985：84）。當時，因為新學制倡行不久，大學生中頗多三十歲以上的人，又因為對軍閥割據的不滿，和受新思潮的激盪，常常發生學潮。學潮中最常有的，是反對不稱職的教授。可是聽過田培林先生課的人，不僅在當時推崇田先生，就是日後仍然對先生禮敬有加（賈馥茗，1976b：5）。

回溯田培林先生此一時期貢獻於教育文化，為河南人士所稱道弗衰者，厥有數事。其一為爭取經費獨立：1922年，田先生當選為河南全省各級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評議會主席，與韓殿珍先生等倡議，以各縣契稅作為教育專款。對軍政方面，據理力爭。得王幼僑先生、焦易堂先生等從旁協助，卒達目的。迄後幾經變亂，而絃歌得以不輟。其二為倡導講學風氣：當時邀請名流學者至開封講學，如梁啟超先生之「中國思想史」、趙元任先生之「考古學」、傅銅先生之「道德哲學」等，中州學術風氣，為之一新。其三為創辦時代刊物：為匡救時弊而振起士氣，曾與同學王警守、楊笠農等發行《少年河南週刊》。評論時政得失，並灌輸新知識，啟發新思想。不特為青年學子所擁護，於「河南留學



歐美預備學校」之改制為河南大學，策進之功，亦不可泯焉（周邦道，1981：321）。

1932年，任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1935年，赴德國，就讀柏林大學（周邦道，1981：320）。

四、留學德國時期的生活

田培林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後，曾經得到一項獎學金，可以出國留學（賈馥茗，1976b：6）。然以身為獨子，雙親在堂，不忍遠遊，惟以任教為務，以便定省（賈馥茗，1998：81），終於為了事親養親而放棄了。至1935年，太公與太夫人相繼謝世，才於1935年去德國，入柏林大學研讀教育（賈馥茗，1976b：6）。由此，也看出田先生的孝順之心。1939以論文《德國高級中學統一形式之問題》經審核通過，並經考試及格，德國柏林大學於4月18日授予哲學博士學位。³

田培林先生在柏林大學研讀教育的原因，第一是在北京大學就學時，受蔡元培先生的影響；但是對蔡元培先生所倡導的美感教育，卻存有若干疑義，希望能夠親自直接的作一番研讀；第二是由於歷年擔任教學工作，確定了對教育的興趣和研究的熱誠（賈馥茗，1976b：6）。

柏林大學是斐希特（Johann G. Fichte, 1762-1814）和洪保爾特（Baron Wilhelm F. von Humboldt, 1767-1835）等計劃建立的，擁有歐洲大學初期時的精神，又具備德國獨有特色，有濃郁的學術風氣和自由精神；而大學的行政管理，又表現出德國的務實和科學，這兩者都深深的影響田培林先生。所以田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由原具有的哲學基礎，並對於哲學家的教育主張，求深刻的認識和評價，以發展建立教育理論（賈馥茗，1976b：6）。

田培林先生學問人格，深受創校校長斐希特、哲學教授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 1882-1963）之影響。尤其，當時斯普朗格擔任柏林大學校長，

其著有《生活類型》（Lebensformen, 1914）、《文化與教育》（Kultur und Erziehung, 1919）、《青年心理學》（Psychologie des Jugendalters, 1924）等著作，對於田先生更是影響深遠（周邦道，1981：320）。田先生對於斯氏的文化哲學，也由親炙而有了透徹的了解。



▲ 田院長任內臺灣師大教育學院外觀
圖：臺灣師範大學提供

在教育實際方面，由於德國學制非常複雜，田培林先生常常直接訪問行政人員，並到各地參觀行政措施和學校實況。在這兩方面之間，田先生對於斐希特的建立柏林大學，以柏大校長而獻身愛國工作更為心折，無形之中，便有了一個大學校長的思想與作為的偶像（賈馥茗，1976b：6）。

當時德國大學的教授，是國家認可的，可是政府並不支付薪給。教授的收入，全靠學生所繳的選課費。因而教授若沒有真才實學，便不足以號召學生，也就無以為生。同時教授開課，各憑自己的專長，所以在同一學期，可能有若干位教授開同樣的科目。因為各人的講授內容和觀點不同，學生不但可以得到多方面的知識，也可以從各方面來做比較。田培林先生常常選讀由不同的教授而開的同名科目，比較之下，可以看出講師為了建立聲望，認真研究而準備充分；又為了延攬學生，而態度和藹；教授則學有所成，思想成熟，學生可以得到獨家之傳。所以單是教育史一科，田先生便選讀過七次（賈馥茗，1976b：6）。

其次，柏林大學的圖書設備，是全國最完備的。每個研究生，⁴都可繳費若干，取得一枚圖書館的鑰匙，無論晝夜，都可自由進去閱讀。如果帶著些食物進去，日夜不出來，也無人干涉。不過按規定，這枚鑰匙不能轉借，畢業後必須交還。田培林先生曾在圖書館飽覽典籍，度過許多辛勤而愉快的時光（賈馥茗，1976b：6）；田先生亦言在其學位論文完成後，查證所引文獻原件，其中

4. 賈馥茗先生（1998：82）曾敘說田先生發現在柏林大學研究教育的研究生中，除了原本學習教育者以外，來自於文、理、法、商者，也大有人在。所以，學生互相研討時，各有其背景知識，融會為廣博的見解。究其原因，即是教育本為涵蓋一切學問的學問，以具有各種背景學識的人研究教育，教育才能具體的培育各種人才。



有上溯百年之資料，塵封已久，為查證確實，得見古籍，深以為幸，於此亦見田先生研究求翔實之一斑。

田培林先生在德國研究教育，志在回國有所貢獻，故對德國教育之實際狀況，至為留意（賈馥茗，1998：82），也因此田先生參觀和遊覽的目標，是具有教育特色之處。除去為了明瞭教育行政，而訪問行政組織以外，田先生曾經訪問過康德的故居，⁵參觀過一所為問題青年而設的「叢林學校」，遊覽過匈牙利而了解德國文化的延展狀況（賈馥茗，1976b：6）。田先生訪問行政人員，參觀學校，並對照地方風土人情，於是悟到教育與文化不可分，進而認為研究社會學科者出國留學，比自然科學更重要。因為研究社會學科時，必須兼知社會風土人情，不入其鄉，無由知其學術背景（賈馥茗，1998：82）。

田培林先生留學德國期間，正是希特勒整軍經武，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故而對於國際局勢的演變，非常關心。由於田先生對世局和國際政治的了解，常常是留學生，以至外交人員請教的對象，也經常應邀講演或撰文論述（賈馥茗，1976b：6-7）。十九世紀，德國、英國、法國等歐洲的學術水準，高於世界其它各洲。而美國、日本、中國的留學生，也都流行到歐洲求新知。田培林先生選擇最著名的德意志國立柏林大學留學，因而結識了很多學術界的領航人物（徐南號，1998：11）。

五、對日抗戰期間的政教工作

日本於1937年發動七七侵華事變，田培林先生在1939年得到柏林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便立即束裝回國，這時正是抗戰期間（賈馥茗，1976b：6-7）。田先生出國時，眷屬留居北平。回國時北平已經淪陷，乃不回北平（賈馥茗，1998：82）。本來已經應西北師範學院院長李建勛先生電聘為教授，又有香港書院洽聘。最後，田先生還是直接回到後方，任教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公民訓育學系（賈馥茗，1976b：7），後來又兼任公訓系主任，同時為《大

5. 康德的故居Königsberg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併入蘇聯領土，並易名為Kaliningrad。

公報》星期評論的撰稿人（戚長誠，1976：45）。西南聯大最先設立在湖南長沙，本叫國立第一臨時大學，後來搬到雲南，才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此大學是由全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設在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一所私立的南開大學組成（張起鈞，1981：8）。

這時，日軍日以繼夜的轟炸後方，田培林先生常要很早起來，隨便在小攤上吃些東西，趁日機飛到之前去上課。有時課還沒上完，日機已經來襲，師生便一起躲到防空洞裡，繼續未完成的講述或討論，直到入夜以後，日機停止轟炸，才能出來吃飯。這種情況，更激發了田先生的愛國心，印證了斐希特的精神。終田先生一生，只聽到說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卻從來不提抗戰時所經歷的艱苦生活（賈馥茗，1976b：7）。

此時國立同濟大學因為內部糾紛，董事會特別邀請田培林先生擔任教務，以便整頓。並且兼任附中的校長，教誨滋事的學生。田培林先生先將大學部愛好滋事而教學不力的一二人停聘，平息了教務方面的糾紛，又每天抽暇和學生相聚，開導學生，教以正義，建立起師生情誼，使大學和中學兩部，能夠正常發展，勝利後遷往上海，成為國內知名的學校（賈馥茗，1976b：7）。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抗戰也進入更劇烈、更艱苦的階段。田培林先生受朱家驊先生之邀到中央組織部擔任黨員訓練處處長，於是依據國父思想，印證斐希特的民族精神，擘畫並執行對黨政人員的組織和訓練（賈馥茗，1976b：7-8）。余瑞麟先生言及1942年，其從西南聯大畢業，往見陳雪屏先生。陳先生介紹其到外交部工作，要余先生去重慶見李惟果司長。到了重慶，時運不佳，說是外交部改組，李司長去職；那時田培林先生在中央組織部，要余先生去參加朱家驊部長辦的講習會，名義是實習員，也因此幫助余先生就了業（余瑞麟，1981：338-340）。由此，我們也看出了田先生提攜後進的行誼。

後來，因河南省居於敵前和後方的折衝地帶，田培林先生受任為河南省黨部主任委員。田先生在任期中，調和軍政，號召地方人士，供應軍需（賈馥



茗，1976b：8）。繼而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委員、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其間，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劉延濤，1976：1）。

田培林先生基於愛國的義憤而出任黨政工作，仍然沒有減低對教育工作的興趣。在河南黨務奠定基礎後，便又回到教育崗位。1945年田先生被任為河南大學校長，不久又因為西北農學院常常發生校產管理問題，兼任西北農學院院長。田先生兼任後，以公平為原則，訂定各系共同管理，而輪流負責的方式，院長本身不干預其事，由是糾紛立止，校務也蒸蒸日上。至抗戰勝利，辭去西北農學院院長的兼職，準備將河南大學自陝西寶雞縣遷回河南開封，以當時交通的困難，費盡周張，才完成了河南大學的復校工作。復校之後，因期望河南大學為國內一所完備的大學，繼恢復因抗戰時停辦之法學院。田先生一方面擴充校舍，一方面增設工學院；又將醫事專科學校併入河南大學，而增加了醫學院（賈馥茗，1976b：8）。至此，河南大學共有文、理、法、醫、農、工六個學院，具備了全科大學的規模。其間合併專科，擴充校園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悉賴田先生秉持教育理念，說服地方人士，努力開啟財源，方始得竟全功（賈馥茗，1998：84）。

1946年夏季，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廬山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田培林先生出席會議，忽然傳出田先生將另膺新命的消息，為了實現作育英才的教育思想，田先生不願再任行政工作，因而乘夜下山，回到河南大學，可是田先生終被任為教育部常務次長，佐部長朱家驊先生，因為感受朱先生之知遇，也成為義不容辭的一個原因（賈馥茗，1976b：8）。

1946年11月，田培林先生轉任教育部常務次長。當時的教育部長為朱家驊先生，朱先生非常禮遇田先生，如朱先生有事時，不是請田先生到部長辦公室，而是自己到次長辦公室，與田先生商討事情。⁶田培林先生為部長朱家驊先生所倚重，常赴各地處理學潮，對於各大學之復員，各級學制之調整，中小學課程標準之重訂，及國際文教之合作，多所費心也（周邦道，1981：

6. 此段敘述為2000年11月30日伍振鷺先生在施宜煌碩士論文計畫發表時，所言及田培林先生在大陸教育部時的情形。

320-321)。

田先生在籌劃淪陷地區之教育重整，並計劃勝利復員後教育實施與改進工作時，其原則之一即慎選大學校長，以有適當資歷與才識者為先。其二為改進師資培養教育，與學術研究分途進行，最顯著者即是將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改制為師範學院，強調師資培育之專門功能，教育與教學研究，成為大學功能（賈馥茗，1998：84）。歐陽教先生於1964年至教育部服務時，曾聞及一些從大陸南京來台灣的教育部老科長們，很佩服田先生，但也說田先生當時脾氣滿大的。但老科長們對歐陽教先生說：「田先生批公文動作很快，判斷事情很快。」⁷也許田先生為人耿介剛直，處事明快果決，在任職次長期間，對不合理之事，或不假辭色，所以才有昔日舊屬傳云田先生脾氣大（周愚文，1992：95），但我們也看出田先生做事及判斷事情果斷的一面。

1947年，田培林先生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河南代表，該年是教育多事之秋，共黨發動戰爭，大學生罷課遊行事件，此呼彼應，各地學潮迭起，使田培林先生的教育思想，無法實現。終至大陸全部撤守，田先生於1949年隨政府遷來台灣（賈馥茗，1976b：8）。

政府遷來台灣後，朱家驊先生專力主持中央研究院之餘，籌組純學術性刊物，介紹中西學術思想，闡揚我國優異文化，曰《大陸雜誌》，田培林先生與董作賓先生負責其事（周邦道，1981：321），而田先生與董先生皆為河南人。

1949年，田培林先生脫離政壇，應聘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授（賈馥茗，1998：84）。政府播遷後，北京大學1920年畢業同學在台者計有十人為羅志希、姚從吾、毛子水、田培林、吳敬軒、鄒湘喬、張儉生、陳梓屏、陸奉初和楊亮功諸位先生。姚從吾先生發起每隔月聚餐一次，地點指定為會賓樓，以其烹調具有北京風味（楊亮功，197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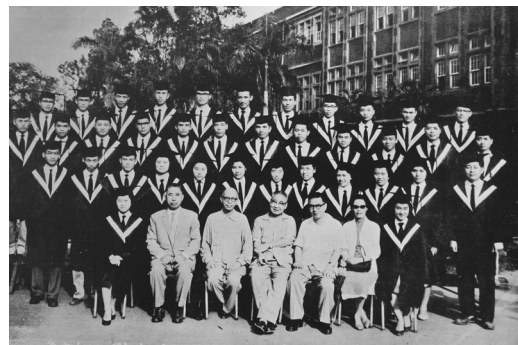
六、臺灣師範大學時期的教育工作

7. 此段敘述為民國200年11月30日歐陽教先生在施宜煌碩士論文計畫發表時，所言及田培林先生在大陸教育部時的情形。此外，根據1955年6月5日的《師大校刊》記載：田培林先生亦曾任國立中央民眾教育館館長。



田培林先生於1949年秋季應聘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教授（賈馥茗，1976b：9），民國1953年8月，當時教育系主任劉季洪先生以主持正中書局，堅辭本兼各職，改聘田培林先生兼系主任（臺灣省立師範大學，1955：7版）。田先生擔任教育系主任時，認為教育系應朝四大方向來發展，即教育學生使成為：一為教育研究工作者；二為教育行政工作者；三為師範學校的教師；四為心理輔導人員。朝此四方向來發展，教育系才有出路，不然教育系一出去，教國文怎麼跟國文系比，教英語怎麼跟英語系比。當時師院教育系助教靳久誠先生說，田先生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為人要公正，靳先生都以此為處世的方針，如田先生常言：「張公道，辨是非，明賞罰，名覈實。」並以此為作事原則，之後靳先生擔任師大圖書館館長時，就是秉持這個原則來處理館務（施宜煌，2001：30）。

1954年田培林先生受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及劉真院長之託，籌設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於1955年師院擴充為大學時，受聘主持教育學院，旋設置教育研究所（孫亢曾，1976：13），當年首次招收碩士班研究生，田培林先生兼任所主任，⁸於是辭去教育系系主任的兼職，只主持教育學院和教育研究所兩個單位（賈馥茗，1976b：9）。當時，師資設備與經費俱感不足聲中，田培林先生曾一再向當局謙辭，但為奠定教育發展之永固基礎計，祇得捨棄個人之利害得失而黽勉應命，傾力以赴。其筆路藍縷，啟關創業之精神于此可見（孫亢曾，1976：13）。



▲ 田培林(第一排右四)與畢業同學合影
圖：臺灣師範大學提供

田培林先生為達到培育師資的目的，也致力於開啟教授進修的途徑，因而師範大學講師得亞洲基金會出國進修者頗多；並促請中山獎學金基金會增設教

8. 教育學系及教育研究所，在1955年時，是系所分開的，所以田培林先生在兼任所主任後，便辭去系主任的兼職。

育學門。至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成立，師大教授得到研究補助或出國進修者歷年皆有（賈馥茗，1985：88）。



▲ 台灣師大教育學院新大樓外觀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初期的三個學院，除了田培林先生任教育學院院長外，文學院院長是梁實秋先生，理學院院長是陳可忠先生，三院院長陣容的堅強，是當時劉真校長最引以為豪的事。而當時的師範大學，除了組織和設備不如臺灣大學，是公認學術水準很高的大學（賈馥茗，1976b：9）。

前教育廳長潘振球先生曾言九年國民教育籌備期間，教育廳曾多次邀請教育學者、專家座談，關於實施之名稱，意見不一，田培林先生表示：「義務教育是免費的，強迫入學的，如果兩者不能同時做到，不宜稱之為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嗣後，總統 蔣公宣佈全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與田先生之意正合，蔣公一向尊重學者之意見，或已有所採擇也（潘振球，1976：20）。

田培林先生在臺灣師範大學的後期，極力培植教育研究的人才。教育研究所的畢業生，多數在國內大學任教；出國深造，得到高級學位後，又回國任教，並從事研究的人也很多，這是田先生晚年頗引以為慰的事。顯然的，田先生的辛苦耕耘，已經開花結實了（賈馥茗，1976b：10）。而教育研究所除碩士班外，自民國1972年起，也增設博士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73：11版）。

七、家人與晚年生活

田培林先生德配程毅志夫人（夫人為湖北人），⁹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師範學院（女師大）教育學士，曾任教育行政工作和大專教授多年，行憲後當選立法委員（賈馥茗，1976b：10）。忠蓋謀國，研學功深，倡和襄贊，一燈對坐，憂

9. 田夫人是湖北人為靳久誠先生所言，伍振鷺先生亦如是說。



樂與共。

田先生子女各二，長子田棋，畢業於臺灣大學化工系，得到美國西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西拉鳩斯大學化工系主任。長媳程麗珠，美國紐約西拉鳩斯大學碩士，生二女：安濤、安瀾。次子田樺，臺灣大學機械系畢業，得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曾任美國鋼鐵公司高級研究員及權利系統公司資訊中心主任。次媳尹文渭，美國希頓山女子學院畢業，生一子二女：子安浩，女安涓、安澄。長女田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音樂系畢業，曾在美國華盛頓大學任教。適洪，生子達維、達德。次女田標，畢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系，得到美國奧立岡大學碩士，曾任美國私立流體力學研究所行政助理。婿鮑亦和，臺灣大學機械系畢業，得到美國紐約霍浦金斯大學哲學博士，曾任私立流體力學研究所所長。生一子一女：子世民，女世芳。均俱有聲稱，能世其家云（賈馥茗，1976b：9；賈馥茗，1998：92；劉延濤，1976：1）。

1961年後，田培林先生以患高血壓停止開課，然每日依舊到校處理院務，接見師生。田先生於1969年辭去教育學院和教育研究所主任兼職，但仍每周一次至教育研究所講授「教育與文化」，為其畢生學術之菁華。1971年9月田先生正式退休，而關心教育研究所如故，閱讀新出版教育及哲學期刊，兼及各種新知識，從未間斷（賈馥茗，1998：92）。在退休後，雖然子女都遠在美國，但是都各有成就，是田先生最大的安慰和快樂。而且田先生的朋友和學生，經常去看問或請益，小小的客廳中，經常客滿，洋溢著先生洪亮的笑聲和談話聲（賈馥茗，1976b：11）。且在1971年時，正值我國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國事多艱之際，因而鬱鬱寡歡，不似往昔之意興遄飛（周愚文，1992：96）。自民國1973年後，田先生因高血壓時感不適，1974年曾入醫院治療月餘。1975年春季先總統 蔣公薨逝，在無言中可見其哀傷，又且憂心國事（賈馥茗，1998：92），4月17日宿疾復作（劉延濤，1976：1），又因血壓升高住進臺大醫院（賈馥茗，1998：92）。惟因患高血壓多年而引起心臟衰竭，午睡後，尚與夫

人閒話家常，不久在閉目養神中安詳而逝，時為1975年5月9日下午，享壽八十三歲（賈馥茗，1976b：11）。遺囑：「不開治喪會，不發訃，不公祭，不受賻，不請褒飾。」其耿介之操，亦堪風末俗矣（周邦道，1981：322）！

參. 結語

佛陀說：「諸法無我」，要人體悟一切存在無我，也就是要去掉我執，證入無我，即達到一種忘我的境界。就忘我而言，田培林先生曾言：「教育是為『人』的工作，到了忘我無我的境界，教育者才能與歷史文化合成一體」（引自賈馥茗，1976a：66）。依此而言，「教育愛」的真正實踐，即是教師心存忘我無我之心來教育學生。是故，「教育愛」的實踐，就是「愛創造的理想」，教師以忘我無我之心為缺少價值的自然人，創造文化價值，使其成為有價值的人，因而「教育的愛」是沒有差別待遇的，沒有貧賤及智愚之分，凡是有所創造而產生價值的，便是愛的對象。而田培林先生即是以其忘我無我的教育愛，為台灣教育文化的開展、傳承而努力。因之，對於一位深墾我國教育文化之教育家，實有必要讓台灣人民瞭解其傳略，進而使當前教育工作者興起效法之心，為教育大業而努力之。筆者即是基於上述理念，因而闡述田先生之傳略，希冀台灣的後代子孫能夠瞭解這位教育人物，老師的老師－田培林先生。

參考文獻

- 毛子水（1981）。國立北京大學簡史。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北京大學**（頁1-14）。台北市：南京。
- 田培林（1995）。論教育與文化。載於賈馥茗（主編），**教育與文化《上冊》**（頁3-11）。台北市：五南。



- 田炯景（1981）。五四的回憶。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北京大學**（頁46-72）。台北市：南京。
- 伍振鷺（1986）。光復四十年來的台灣教育。**大陸雜誌**，72（3），129-134。
- 余瑞麟（1981）。往事如煙。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頁336-340）。台北市：南京。
- 李安（1976）。學人的典範。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頁55）。台北市：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
- 周邦道（1981）。**近代教育先進傳略初集**。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
- 周愚文（1992）。中國文化教育大師—田培林。載於劉焜輝（主編），**人類航路的燈塔：當代教育思想家**（頁92-109）。台北市：正中。
- 施宜煌（2001）。田培林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學術事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孫亢曾（1976）。追思伯蒼先生。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頁13-15）。台北市：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
- 徐南號（1998）。懷念吾師。載於林玉体（主編），**跨世紀的教育演變**（頁5-14）。台北市：文景。
- 戚長誠（1976）。悼念田培林先生。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頁44-46）。台北市：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
- 郭廷以、沈雲龍訪問，謝文孫記錄（1991）。**從高小到北大的求學生涯—田培林先生訪問記錄**。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口述歷史**（2）（頁27-44）。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73）。教育學院的現況與發展計劃。**師大校刊**，190期，11版。

- 張起鈞（1981）。西南聯大紀要。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頁8-50）。台北市：南京。
- 賈馥茗（1976a）。痛失良師。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頁61-66）。台北市：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
- 賈馥茗（1976b）。田培林先生的教育思想簡述。載於賈馥茗、黃昆輝（主編），**教育論叢（二）**（頁1-46）。台北市：文景。
- 賈馥茗（1985）。田培林。載於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三冊》**（頁83-100）。台北市：近代中國。
- 賈馥茗（1998）。田培林傳。載於國史館（主編），**國史擬傳第七輯**（頁79-93）。台北市：國史館。
- 楊亮功（1976）。人事靡常清遵難續。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頁6-7）。台北市：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
-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1955）。各系簡介。**師大校刊**，5141期，7版。
- 潘振球（1976）。憶伯蒼先生。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頁20-21）。台北市：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
- 蔡元培（1981）。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北京大學**（頁26-35）。台北市：南京。
- 劉延濤（1976）。田伯蒼先生行述。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頁1-3）。台北市：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
- 劉季洪（1986）。**教育生涯漫談**。台北市：臺灣商務。